

桂
堂
文
库

姚春树 | 著

中国现代杂文 散文杂论

ZHONGGUO XIANDAI ZAWEN SANWEN ZALUN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现代散文
散文杂论

姚春桐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姚春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01-013880-0

I. ①中… II. ①姚… III. ①杂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②散文-
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651 号



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

ZHONGGUO XIANDAI ZAWEN SANWEN ZALUN

姚春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375千字

ISBN 978-7-01-013880-0 定价:6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福建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肇始于1907年由清末帝师陈宝琛先生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示福建高等教育的先河和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承传1908年筹设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5年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的学科积淀,历经百年建设,发展成为东南名校。

我校中文系与校史一样源远流长,主要由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文科、协和大学与华南女院等中文系科发展而来,于2000年改设文学院,现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三系。文学院的学术源流,既呈现了陈宝琛、陈易园、严叔夏、董作宾、黄寿祺诸先贤奠定的传统国学,又涵衍着叶圣陶、郭绍虞、章靳以、胡山源、俞元桂等名家开拓的现代新学,堪称新旧交融,底蕴深厚。其中,长期为学科建设殚精竭虑而贡献卓著者,当推前后执掌中文系务三十年的经学宗师黄寿祺(号六庵)教授和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号桂堂)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程,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稳步发展,屡有创获。由六庵先生和桂堂先生分别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点;1995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家教委确认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一举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博士点,2000年又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2001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3年获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此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级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各1个和精品课程4门,综合实力居全国同类院系的先进行列。

先师桂堂先生,1942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系国学名师陈易园、严叔夏先生之高足;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又师从文献学家李笠教授和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1946年获文学硕士后,受严复哲嗣叔夏先生举荐回母校执教,直至退休。1956年起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六庵先生操持系务,1979年接任系主任,至1984年卸任。先生从教五十年,早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1951年起奉命转治现代文学,晚年创立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桂堂述学》及散文集《晚晴漫步》、《晓月摇情》等,与六庵先生同为我校中文学科德高望重的鸿儒硕老。文学院此次策划出版两套学术文库,分别以两位先师的别号命名,不止为缅怀先师功德,更有传承光大学术门风的深长意味。

《桂堂文库》首批辑录11种,均来自我校现代文学学科群三代学者,包括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等学科。老一辈名师中,孙绍振教授以《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汇集他在中外文论、文艺美学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精品力作,姚春树教授则以《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显示精鉴博识的特色。中年专家有6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帆的《表述与意义生产》畅论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问题,辜也平的《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琢》在巴金研究和传记文学探索上有所创获,席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中阐发学科史和思潮史的新见,潘新和专门论述《“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赖瑞云则细心探讨文学教育的《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的理论与实践,拙作《现代散文学初探》只是附骥而已。新一代学人有郑家建的《透亮的纸窗》、葛桂录的《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和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在各自领域显示学术锐气。原作俱在,可集中检阅我们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和治学风气,我作为当事人不宜在此饶舌,还是由读者独立阅读和评议吧。

汪文顶

二〇一四年夏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辑 中国现代散文杂文理论管窥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前言 / 3

中国杂文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 / 21

一个崭新的课题:创建中国现代杂文美学 / 55

第二辑 鲁迅杂文三论

鲁迅杂文的“理趣”美 / 99

鲁迅与庄子 / 103

鲁迅与司马迁 / 123

第三辑 “鲁迅风”杂文举隅

“鲁迅风”和“野草”杂文流派 / 155

论聂绀弩建国前的杂文创作 / 187

论唐弢的杂文和杂文理论 / 201

论田仲济和“鲁迅风”杂文 / 216

第四辑 “别具风采”的三家杂文随笔

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 / 231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 239

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 / 246

第五辑 巴金、郭风散文论

论巴金建国前的散文创作 / 253

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

——论巴金晚年散文创作 / 269

郭风散文论 / 299

第六辑 中外杂文散文比较一瞥

东西方几位美学家散文理论述评 / 315

论欧美杂文及其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影响 / 338

中西古典浪漫散文的两座高峰

——庄子、卢奇安散文同异论 / 364

第一辑
中国现代散文杂文理论管窥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前言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选》，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史的一种副产品。我们在撰写《中国现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现代散文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足迹，触及了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国现代散文同中外优秀散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是珍贵的文学史料，也是一笔值得重视的理论财富。对于这份理论遗产，过去显然重视不够。比如，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其中收有小说、诗歌、戏剧等的理论资料，唯独没有现代散文的。

这里，我们想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发展轮廓，中国现代散文理论里面比较集中探讨的几个问题，作些简要的说明。

一

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917年文学革命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第一期，1927年下半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第二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第三期。

第一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人的思想大解放，审美观念大解放，以及文体和语言形式大解放的“破旧立新”的时期。就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的

产生和发展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主要内容:

其一,散文概念从只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广义散文向文学散文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所谓散文,通常是指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文文体,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这种状况,在新文学运动兴起后,有了逐步的改观。例如,刘半农在1917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他所认为的“文学散文”是指与“诗歌戏曲”相对,同时不包括应用文在内的“小说杂文”,他这时还没有在“小说”和“杂文”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又如,傅斯年写于1918年12月的《怎样做白话文》,是专门论述白话散文写作的,他把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这较刘半农前进了一步,但他又认为散文包括“解论”“驳论”“记叙”“形状”,说明他仍是把散文看为一种广义的散行文字。1921年后,周作人发表了《美文》,王统照发表了《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胡梦华发表了《絮语散文》,这些散文理论文章,已不是仅把散文看为一种散行文字,而是视作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特殊文学形式,都强调文学散文的“美文学”特质,例如周作人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称之为“纯散文”(Pureprose)说它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胡梦华则称它为“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这标志着人们对文学散文特质认识的深化和飞跃;这些文章也都针对当时的复古派把凝炼隽美的古典散文称为美文,而把白话散文斥为俚俗粗鄙的“街谈巷语”,理直气壮地把白话文学散文称为“美文”。这既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也引导初创期的白话散文创作从一般的散行文字向美文学突进。

这里有两点需要顺带指出的,一是现代散文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综合概念,人们在不同层次上使用这一概念时,其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文学散文这一概念时是泛指包括文艺杂感(杂文)、记叙、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等各种样式的散文的,这我们可称之为广义的文学散文;有时则排除杂文和报告文学在外,特指记叙、抒情散文的,这我们可称之为狭义的文学散文,或纯文学散文,可以说自“五四”迄今,文学散文这个概念始终未加统一的规范和界定。二是这时的新文学营垒内,无论是《新青年》同人,文学研究会同人,创造社同人,《语丝》社同人,《现代评论》派同人,在

反对文言文,主张白话文的大方向上是大体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坚决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其二,反对封建旧文学的“载”儒家之“道”,“代圣贤立言”,突出强调散文创作要写实求真,鲜明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征。

我国的古典文论,甚难突破“原道”、“征圣”、“宗经”的思想樊篱,这极大限制了散文的发展。“五四”时期散文理论与此针锋相对,突出强调散文创作要写实求真,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征。周作人在《美文》中说文学散文“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要真实简明便好。”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强调作家要敢于正视现实、表现现实,写作“真人”(《坟·论睁了眼看》),说读者认为他的杂文的最重要特点是“说真话”(《写在〈坟〉的后面》)。胡梦华在《絮语散文》中说诗和散文是“近世自我的解放和扩大”,“絮语散文”的主要特点不在于它是“家常絮语”“家人絮语”,而在于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的……”现代散文理论的这些主张,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就散文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立论的,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的优秀传统。

其三,这时的散文理论倡导者大量输入欧美的散文理论。

周作人要人们写作散文时以欧美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等为“模范”(《美文》),王统照的散文分类依据的是亨德《文学概论》一书的理论,胡梦华则介绍欧洲从蒙田、培根至兰姆、韩士立等“絮语散文”的源流;而对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产生更深远影响的,是鲁迅翻译的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

厨川白村论英国的“Essay”(小品随笔)时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在 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事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

厨川白村对“Essay”的论述,对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是有影响的。

在《出了象牙之塔》里,厨川白村在论述“漫画”和“现代文学之新潮”时说:

文艺的本来的职务,是在作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以指点向导一世……

这话对鲁迅有深刻的启发。他在《两地书(十七)》和《〈华盖集〉题记》中,反复申说他所以写作杂文和创办《莽原》周刊,是为了对旧中国进行毫不留情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而社会批评、匡正时弊,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杂文创作主流的“鲁迅式”战斗杂文的主要标帜。从这点上说,厨川白村对杂文创作和理论的影响,是需要加以揭示的。

这时的散文理论,对中国古典散文创作和理论估价不足;也没有来得及对当时繁花竞发、异彩纷呈的散文创作作充分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据胡适统计,“五四”以后,全国有四百种左右的白话报纸,据阿英估计,在新文学运动的头十年,全国文学期刊有两百多种。新闻事业的发达,是散文创作繁荣的重要条件。当时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皆载杂文,成了一时的风尚,发表的杂文可以说是数以万计的,“周氏兄弟”、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邵力子、陈望道、林语堂、陈西滢等,是这时的杂文名家;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也常刊登纪实、抒怀的记叙、抒情散文,“周氏兄弟”,朱自清、谢冰心、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是这方面的名家;瞿秋白、叶圣陶、朱自清、郭沫若在这时已创作了以后称为“报告文学”的名篇;鲁迅、刘半农、许地山、焦菊隐、于赓虞等,这时也创作了同古典散文中的小赋、小品有渊源,但同波德莱尔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有更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中国现代散文诗一诗的散文。可惜当时的散文理论都未能对这一切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总结。

第二期是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的全面丰收的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在前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从复杂尖锐的社会斗争

中汲取源泉,从中外散文的优秀传统中汲取营养,散文创作的社会内容明显扩大了,艺术上较前也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专登散文或辟有散文专栏的期刊报纸,1934年,文学期刊有四百种以上,“小品文”(即广义的文学散文)风靡整个文坛,出现了大量散文名家,其中有鲁迅等“五四”时期的散文大师,也有一大批是新出现的才华焕发,风格卓异的新秀。散文创作的蓬勃发展和人们对散文创作的普遍重视,推动了散文理论建设的丰富和发展。主要内容:

其一,文学散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散文的取材范围、思想倾向的争论和散文多种样式理论的提倡。

30年代初,在小品文风靡整个文坛的时候,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之间,围绕着小品文问题有过争论,中心是散文创作的内容和倾向问题。

林语堂是当时小品文创作的最积极鼓吹者,他先后主编过《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著名小品文刊物。他的积极提倡,对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应该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当时有不少著名作家在他主编的小品文刊物上发表散文。林语堂的小品文理论,不乏精辟见解。他鼓吹创作以“闲适”、“幽默”为格调,以“自我”“性灵”为中心,以“文中之白”(即文言夹白话)为形式的小品文,他认为写作这样的小品文,以晚明“公安派”,英国的那些充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趣味主义的 Essay,以及当时渐趋消极的周作人的小品文为圭臬。他的理论主张,反映了在当时民族危机、阶级斗争特别尖锐、残酷形势下,一部分害怕斗争、消极避世、只求自我的“闲适”“趣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心理。

林语堂企图把这种小品文理论强加于整个散文界,使整个散文界成为实践这种理论的“一统天下”,朱光潜当时就不同意他的理论(见《论小品文》),所以他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更不足为怪了。1935年3月,《太白》杂志编辑出版了《小品文和漫画》一书,收录了他们在争论中写下的文章。他们认为小品文不能脱离时代和人民,不管是从国家大事或个人身边琐事取材,都必须说出大众的心里话,其情趣和表现形式,应该灵活自由多样,可以幽默、闲适、絮语,但首先必须是鲁迅说的是战斗的“匕首”和“投枪”。这

反映了在时代的前进中,人们对散文自觉表现时代和人民的社会功能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

这一时期文学散文的样式有了新发展,其中文艺杂感(杂文)成为最重要的散文样式。鲁迅和瞿秋白是这时期也是现代散文史上最重要的杂文理论家。鲁迅在给自己或给别人杂文集所写的序跋,他围绕杂文论战所写的文章,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都是人所共知的现代散文史上有关杂文的最重要理论建设文章。他们的杂文理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些微的差异。鲁迅把杂文看为是“杂”体文(见《〈且介亭杂文〉序言》),瞿秋白则认为鲁迅等的文艺杂感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相较之下,前者的说法更符合实际。郁达夫是日记和传记文学的积极提倡者。他在《日记文学》(《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二期)中指出这一体裁是文学的重要分支。他在《什么是传记》(见《文学百题》)和《传记文学》中(见《闲书》)中,概述了中国传统传记的源流及其局限,主张仿效西洋近代传记创立“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对建立新的传记文学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茅盾、曹聚仁、徐懋庸、陈望道、柳湜、贾祖璋等热心提倡历史小品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小品。茅盾指出写作这两种小品,是“非常切要的”,“一方面是科学或历史与艺术的结婚,另一方面是科学或历史走进大众队里的阶梯”。(见《科学和历史小品》)。报告文学是这时期的重要散文样式。左联是报告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倡导者和组织者。袁殊的《报告文学论》、阿英的《从上海事变到报告文学》、胡风的《关于速写及其他》、周立波的《谈谈报告文学》、茅盾的《关于报告文学》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理论文章。茅盾指出报告文学的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它有“浓厚的新闻性”,“必须充分形象化”,可以运用小说创作的艺术方法,但人物和事件必须“真实”,不能虚构。当时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究竟是文学散文的一种,还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看法并不一致。阿英、周立波、茅盾认为它是从散文发展而来,并从中分化出来的独特文学形式,而袁殊(见《报告文学论》)、郑伯奇(见《小品文问答》)、朱自清(见《什么是散文?》)则认为它属于文学散文中之一种。

其二,比较全面总结和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创作成就和经验、风格和流派。

朱自清的《论中国现代小品散文》和钟敬文的《试谈小品文》，是这时较早出现的这方面的文章。此外还有：现代散文选集序跋，如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序》，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孙席珍的《〈现代中国散文选〉跋》；关于散文作家专论的，如茅盾的《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冰心论》、《落华生论》，许杰的《周作人论》，胡风的《林语堂论》，赵景深的《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等；研究小品文专著的，有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冯三昧的《小品文作法》、石苇的《小品文十讲》、钱谦吾的《语体小品文作法》等等，这琳琅满目的书单，反映了人们研究现代散文的盛况。

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导言》，概括了中国现代散文特征，即“个人”的发现，取材范围的扩大，人性、社会性和自然的调和，以及幽默味等，指出现代散文同中外散文传统的关系，这应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郁达夫对他所选的鲁迅、周作人等16位散文家创作风格的评议，也很精辟。朱自清早在《论中国现代小品文》中就指出过中国现代散文创作样式、风格和流派的多样性，他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捷，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但对中国现代散文的风格和流派作较深入研究的要推阿英。阿英为他所编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写了总《序》和小《序》。总《序》勾画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轮廓，小《序》则对从鲁迅到陈西滢等十六位散文家创作风格作了较郁达夫更细微的分析。阿英把现代散文概括为鲁迅的“社会斗士”派，周作人的“田园诗人”派，林语堂的“逃避现实”派，这种三分法，虽不太科学，但却是有意义的尝试。对中国现代散文特征和发展规律，风格和流派作这样的研究是理论上渐趋成熟的标志。

其三，比较正确地对待中外散文创作和理论。

同前期相比，这时人们已重视从中国古典散文创作和理论中吸取营养。这时有大量中国古典散文选问世，特别是晚明小品更风靡一时，一些研究古

典散文和文论的著述也相继出现。属于“论语”派系统的期刊,较系统介绍西方的小品文和杂志文及其有关理论,如林疑今翻译的英国小品文名家史密斯的《小品文作法》即是。著名散文家梁遇春的《〈小品文选〉序》,是介绍英国小品随笔的代表作。“新月”派的梁实秋的《论散文》,也是篇值得注意的散文理论文章。梁实秋是文艺批评家、翻译家和有自己风格的散文家。《论散文》依据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著名文论,集中论述散文艺术的“文调(按通译为‘风格’——笔者)美”。他认为散文是最能表现作家独特“文调”(风格)的一种艺术形式,散文家要使所写散文有“文调美”,必须要有“作者的性格的流露”,遣词造句要有“作者的自觉的选择”,布局谋篇上要“简单”,即那“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状态”,行文要“活泼流动”、“自然”、“亲切”……这些论述都搔到痒处,颇有见地。但梁实秋片面崇尚“高超”“雅洁”的“文调”,而对当时追求“通俗化”和“大众化”文风的散文创作,则加贬抑,斥为“恣肆粗陋的缺点”、“泼妇骂街的口吻”,反映了他的政治偏见,因而受到郁达夫批评(见《散文二集导言》)。

这时同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适应,人们在介绍外国散文创作和理论时,注重外国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作家的散文创作和理论。1932年,瞿秋白翻译了《高尔基论文选》,这是我国第一本的高尔基的论文、书信、随笔选,它和译者翌年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创作和理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外,如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中关于小品文的论述,德国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理论,约翰·里德和史沫特莱等关于报告文学创造的经验,这时也都译介进来了,使人一新耳目。

第三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时杂文和报告文学相当繁荣,叙事抒情散文也有新的特色,对散文理论的探讨虽不如前一阶段,但对杂文、叙事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等散文样式如何更好地为时代服务和提高艺术表现力的规律性问题,也有新的拓展。比较集中探讨三个问题:

其一,如何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中曾提出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存在着“鲁迅所倡导的杂文运动”(该文刊于夏征农编的《鲁